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欧梵 著 王宏志 等译



50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欧梵 著 王宏志 等译

I-100.6
L-124.0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 李欧梵著; 王宏志等译—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225-820-4

I. 中… II. ①李… ②王… III. 作家评论—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437 号

本书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欧梵著 王宏志等译

责任编辑: 陶学钢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7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二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20-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欧梵，哈佛大学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197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随笔集《狐狸洞话语》、《世纪末的沉思》等。

中译本自序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英文原著是根据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删节改编而成，论文于1970年写完，书于1973年出版，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了。

承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各位同行学者不弃，早在七十年代即有人分章摘译，尤其是内中的郁达夫和徐志摩部分，但因种种原因，此书的中译本一直未能面世。在此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在他百忙之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翻译班子”把全书译了出来，并交由陈子善先生安排出版，令我不胜荣幸。但也有点汗颜，总觉得这本旧作早已过时，不值得重读，又没有用任何文学理论，当时全是闭门造车的成果。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对我特别爱护，论文照章全收，而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教授则仅建议我把原来的一千余页的论文删减一半始能出版。如今这两位恩师皆已作古，我也刚从哈佛的教职退休，非但整个世界变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浪潮早已席卷一切——而且文学研究的学术典范(paradigm)也变了：文学研究和文本细读已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研究”；然而，对我而言，文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或可说是历史的“表征”)，而历史也依然蕴藏于文学之中，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尤其如此(这是否是文化研究，暂且不论)。此书写的虽是历史——“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但用的却是文学的体裁，文史不分家，

也。在《...》中，...

大端文库

• 第一辑:

- | | |
|-----------|---------------------|
| 最后的天空之后 |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
|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 马克·里拉 等 编 |
|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 威廉·L.夏伊勒 著 |
| 开放的作品 | 安伯托·艾柯 著 |
|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 马克·里拉 著 |
| 行为糟糕的哲学家 | 尼格尔·罗杰斯
麦尔·汤普森 著 |

• 第二辑

- | | |
|-------------------------|-------|
| 新文学的传统 | 夏志清 著 |
|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 李欧梵 著 |
| 小说稗类 | 张大春 著 |
|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 张灏 著 |
|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 张灏 著 |
|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 | 张灏 著 |



责任编辑:陶学钢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郑 岩

目 录

1 中译本自序

第一部分 背景

- 3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29 第二章 文坛和文人现象
42 第三章 林 纾
58 第四章 苏曼殊

第二部分 两位倡导者

- 81 第五章 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
110 第六章 郁达夫：自我的幻象
125 第七章 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159 第八章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第三部分 浪漫的左派

183 第九章 郭沫若

212 第一章 郭沫若

第一部分

背景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随之发生的已是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在全国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①。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已有二十年的历史。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自唐代以来,中国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②。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0),第11章。

^② 林语堂:《中国新闻及舆论史》(上海,1936),第11页。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①。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②。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开创了民报出版的先河。此后,十九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③。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可说是最先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④。但他可不是孤军作战的。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⑤。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1903

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①。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1897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②。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着援引西方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③。《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

① 前引袁昶超著作,第43页。

② 同上。

③ 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北京,1954—1957),《附录》,第106页。

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①。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德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报刊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趸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②。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内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人。

“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

^①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1958），第14—16页。

^② 杨世骥：《文苑谈往》（重庆，1945），第11页。

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

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者文人”所操控。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成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①。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争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②,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新青年》发出“新文学”的响亮号召,作者们需要更多渠道宣扬他们的理想,并且试笔。他们很幸运地在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找到肥沃

① 这个名称取自一本杂志的题目:《礼拜六》,由周瘦鹃创办。杂志以“轻松的小说和没有重要性的文章”为号召(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84页),而且刊载剧院和电影的著名女演员、社交名媛以及时装模特儿的照片,以吸引读者。杂志里的爱情小说的主题,通常以一双多愁善感的恋人所面对的考验与苦难为中心——苍白的、身染肺病的才子无助地爱上一个迷人但却饱受摧残的歌女或者落难佳人。胡适讽刺地提出这些故事的一条典型公式:“一天,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到一个游乐场远足。他看到一个女孩子,凝望她,继而发现她十分美丽。这个女孩故意把手帕掉到地上,然后青年把它带回家。对女孩日思夜想,他于是病倒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评论家,为这种以文言或半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加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尽管他们如此批评,《礼拜六》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仍拥有最大的发行量。其他属于同一派别的杂志包括:《紫罗兰》、《红杂志》、《半月》、《红玫瑰》,以及许多随报纸附送的文艺副刊,全都在上海出版。“鸳鸯蝴蝶派”的书目指引,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1962)。

② 细节见阿英:《晚清文艺报章述略》,以及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清小说史》(香港,重印,1966),第2页。

的土壤。在上海,国民党的《民国日报》通过其文学副刊《觉悟》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刚刚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刘大白,便在这份副刊上首次试验了他的半白话爱情诗^①。其他著名的投稿者还包括: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②。同时,新文学在《学灯》上找到另一个发表的途径。《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也是由梁启超的弟子所组成的“研究系”的喉舌。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并且刊登了郭沫若寄来的每一首诗,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郁达夫的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最初也在《学灯》上连载。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由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学的第三位斗士是北京的《晨报》。它的文学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都要归功于一位热忱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经戏称自己为“没有作品的作家”的孙伏园^③。他抱着一种传教式的热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份副刊上连载的。1923年,因为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在未经孙伏园同意的情况下,在付印前被另一位编辑抽起,孙伏园愤而辞职^④。但是这本备受推崇的杂志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下跌,而且在1925年徐志摩当主编的时候达至了新的高峰。而孙伏园离开《晨报》以后,接掌了北京《京报》的文学副刊,继而把它变为另一个新文学的堡垒。

^① 例子可见曹聚仁:《文坛三忆》(香港,1954),第25页。